革命之路云和月

靳怀刚口述　刘玉平整理

我出身于一个大军阀、大资本家、大地主三位一体的家庭。伯父靳云鹏系皖系军阀，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徐世昌执政时期两次出任国务总理；父亲靳云鹗系直系军阀，曾任吴佩孚的副司令、河南省省长；叔父靳云鹤是北洋政府陆军部的少将参议。他们都曾威赫赫名噪一时。靳家在北京、天津、济南等地拥有众多的楼房公馆；拥有济南的大观园、淄博的洪山煤矿（原鲁大矿业公司）、鲁丰纱厂等工商业、房地产；在原籍山东省邹县境内和与邹县相毗邻的济宁、兖州、滕县等地霸占土地两万八千多亩，其拥有量在鲁南来说，仅次于孔孟两家。我作为靳云鹗的长子，是民脂民膏养大的，在矛盾重重的社会、家庭中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。在抗日民族革命浪潮的推动下，我跳出了这个家庭，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之路。古人说："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"回首我所走过的路，大体就可用这两句诗来概括。

（一）

我童年记忆最深的是一九二七年，那年我九岁。当时，北伐革命军攻至武汉，作为汀泗桥重要守将的父亲终被战败，国民党政府对他下了通缉令。他回到天津，躲进外国租界当了寓公，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和家人随父亲回到天津。那时，伯父早已下台也寄居天津。他们在政治上虽然都不再拥有权力，但树枯影留，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然通官府，吃四方，终日花天酒地，宾客盈门，拥有很强的潜势力和雄厚的资本。俗话说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就是在这个家里，我过了十九年的大少爷生活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本在我国东北境内的侵略军突然炮击沈阳。由于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，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，使日军很短时间内，就占领了我东北全境。当时，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，经常从报纸上看到东北战况，对日军侵略非常不满。不久日军又发动了天津事变，天津的局面顿时大乱，日军在租界与华界的大街上随意搜查打骂行人，更使我义愤填膺。南开中学后面原是一片开旷地，日军在这片旷地里建了打靶场，枪炮声终日不断，搅得我们无法上课，老师学生都非常气愤，而当局却根本不问。我多次在去北京的火车上，亲眼看到一些日本人和朝鲜浪人在客车上装了许多货物，将车门和通道堵塞，中国乘客无法行走，发生争执后，日本人蛮不讲理，肆无忌惮地动手打中国人，而乘警不但不责备他们，反而责怪中国乘客，令人十分气愤。当时我想：“为什么外国人不拿中国人当人待？而这些中国人也拿中国百姓不当人待？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怎能容忍敌人入侵、逞凶？”为此，我常在同学中或回到家里时发议论，也有时把听到的有关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消息带回家里。家里却阻止我，不让我管，不让我说，只让我潜心读书。为什么不让我说，我当时想不通，心里不服，就回避着家庭，去接近一些进步同学。从而，接受了一些革命思想，要革命的想法逐日萌发。

一九三四年我初中毕业后，家庭迁居北京，我也转学到北京读高中。一九三五年秋，我父亲病死在北京，我就成为我们这一支的“名誉家长”。不久，我家又迁居济南，我仍留在北京读书。这年六月，卖国的“何梅协订”签订之后，民族危急日益严重。十一月间，日寇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，并指使汉奸殷汝耕

在河北省东部成立傀儡政权。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，居然同意成立什么“冀东自治政府”，以迎合日军的要求。由此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对，终至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广大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示威，我们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。由于我出身于那样坏的一个家庭，我虽是学生班级的班长，班里的进步同学并没有事先通知我，及至我也到了街上，他们才给了我一张口号单，让我领呼口号。我们一齐高呼：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！”、“冀东自治政府是卖国政府！”、“打倒卖国贼殷汝耕！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等口号。大街上，学生队伍浩浩荡荡，一边前进，一边高呼口号，非常气派！正在游行时，国民党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前来镇压。同学们认为我领呼口号最保险，即使被捕也不要紧：当时的北京市的警察局长袁良曾是靳云鹏的老部下，如果我被捕，只要家里人说句话，就会把我放出来。军警用马队、摩托车、枪刀棍棒、水龙头等驱赶赤手空拳的学生，当场被打伤、被捕的很多。我被水龙头冲了一身水，我与三个同学闯到消防车旁，抢过车上的板斧，砍破了水龙带，使得队伍继续前进。军警的镇压更加激怒了爱国学生，第二天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。学生运动得到了北京工人阶级和市民的同情，运动象扑不灭的烈火继续蔓延开来，到“一二·一六”，学生、市民万余人再次齐上大街游行。国民党政府又增派军警镇压，马队在人群里横冲直撞，军警用军棍刀背乱打乱砍。那天，我仍然在队伍前头领呼口号。马队冲来时，在混乱的人群中，我又挨了一刀背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爆发，很快播及到全国。天津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南京、长沙等地的爱国学生也相继举行了游行声援，形成了爱国运动的新高潮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使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，团结的力量。自那以后的许多天里，我的心都平静不下来，

总觉得有一股热血在沸腾。当时自己虽然对党了解得还很少，但总觉得共产党是好人，能够领导人民救中国。同时对日军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愤恨至极。

在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之后，同学们约定组织南下宣传。我正在准备行李，就被家里人知道了。已经倒台的伯父指使家人把我骗到天津软禁了起来，不让我“胡闹”。靳云鹏虽然看不起流氓出身的蒋介石，常常骂蒋。但他出于阶级本性，对共产党是持反对态度的。所以才反对我同进步同学接近，说我是“中邪”，是“异端”，不合官宦门第的规范等。让我走“学而优则仕”或者是“科学救国”的路，甚至说，只要我不当败家子，能守住已有的财产，也够我们几辈子受用的。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。在被关的日子里，我也明白了进步同学在游行之前不告诉我的原因。唉，谁叫自己有这么个家庭呢？可又有什么办法，家庭出身问题岂能由个人选择。

恰恰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家里闹得一团糟：两个弟弟和庶母闹得很僵，矛盾非常尖锐。我的上一辈，男男女女，几乎没有一个不抽鸦片烟的，他们终日价吃喝玩乐，灯红酒绿，挥金如土。对财产则是你争我夺，家庭开支直线上升，已是坐吃山空之势。于是引起种种纠纷，正象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写的“除了门前的两个石狮子干净，其它就没有什么干净的东西了……”当时，我的家庭和那个贾府很相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矛盾的各方都寄希望于我，希望我能够把家庭的担子挑起来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振兴家业。可是，这是一个“似大厦将倾，似灯将尽”的家，无法维系，无法支撑。其实，也无须维系，无须支撑。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但我自己不甘堕落，我从来认为继承祖业当阔少爷是没出息的，是可耻的。特别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严重形势下，当了阔少爷，就要做亡国奴，或者到外国去逃避现实。这一切，都迫使我急需选择自

己的人生之路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我决定走出这个封建末日的摇摇欲坠的官僚地主之家，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。

经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考验，一些进步同学同我接触多了，我也愿意向他们靠拢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读了不少进步书籍，如柳湜的《如何生活》、邹韬奋主编的《生活杂志》以及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《政治经济学大纲》等马列主义的启蒙读物。有的书自己虽然读不大懂，但思想在渐渐转化。我对苏联有一些了解，初步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。这一时期，我也乐意多做点工作。譬如，开始以自己的特殊身份骑摩托车传送文件，同别的学校进行通信联络，或是把一些秘密文件之类的东西藏到我家里。在学校，我们同国民党的走狗校长展开了斗争，把他赶下了台，另推举比较进步的总务主任王化云当校长。可是不久，被我们赶下台的反动校长又回来了，他把我们视为眼中钉。这个学校无法再呆下去了，我只好转学。

转到另一个学校后，我同进步同学的来往中，发现了问题：我知道有的同学是民族解放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）的成员。每当我问起民先组织我能否参加和有关共产党的一些问题时，他们总是回避我，只让我去做具体工作，不让我知其所以然。因此我想不通：无论是“一二·九”游行，还是“抬”校长，我都是卖力的，忠实的，现在为什么回避我？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认为我留在革命组织之外，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点。我也消除了委屈埋怨情绪。

（二）

一九三七年，我刚高中毕业不久，就发生了“七七”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大举侵华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八月，我来到了济南，重新见了平津时的进步同学李立知、李焕、滕国定、邝炳跃等人。国难当头，同学相见，亲同手足。我倾吐了对党的向往和愿为抗日救国洒血流汗的想法。李立知等同学给了我同情和安慰，介绍我加入了“民先”（党的外围组织）。“民先”省队部就安排我们到齐鲁大学去开辟工作。我一面读书，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及组织师生到火车站去救护前线运下来的伤兵。

齐鲁大学是九月一日开学，开学不到两个星期，日寇就已兵临德州，严重地威胁到济南，学校也办不下去了，决定南迁到四川成都华西坝去。是走是留？我们请示了山东省队部，省队部决定派我们到鲁南我的家乡，利用靳家的社会关系去开辟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工作。当即组成了“民先邹县县队部”，指定李立知同志为队长，李焕、滕国定、邝炳跃和我为队员。先以邹县为基点在兖州、济宁、滕县一带发展“民先”的组织，同时利用靳家的看家枪枝发展武装，组织游击队。在九月下旬，我们一行到达邹县。当时，邹县地下党已经被韩复榘的侦探队和国民党邹县警察局破坏，党的负责人彭建华、冯起等同志尚被押于济南，地方上少数几个党员也全已隐蔽，无法取得联系。我们便先到了我的“家”之一的望云村。

我的祖籍原是峄山下的苗庄。清末年间是个中农户，生活拮据。全家人除种自己很少的一点土地外，还在大路边上开茶馆、卖茶水及绿豆面丸子，以维持生活。遇到一个灾年，我祖父去逃荒要饭了，靳家兄弟先后出去当兵。在战乱中，他们官运亨通，很快发迹起来成了大军阀，直至爬上了省长和国务总理的宝座。从此，声势烜赫，青云直上。因靳家的男人都在外当官，已经出嫁的三姑妈又回到靳家主持家政。她外号“张大脚”，人称“张老妈子”。她善用机关，是个王熙凤式的人物。一方面明结官府，暗勾土匪；另一方面又布施僧侣（主要是峄山的僧侣），标榜她的所

谓“慈善事业”，借以欺骗麻醉人民。她通过收地租、买卖土地、兼做粮食屯积商等手段，残酷剥削劳动人民，大肆搜刮民财。在仅仅二、三十年里就霸占了两万八千多亩土地（这个数字是后来听知情者说的），使靳家一跃而为闻名鲁南的特大“暴发户”。靳家在望云、郑庄、娄庄建了家园和庄子，每处都是青瓦一片。家中藏有长枪一百多支，短枪十多支，还有机枪。蓄雇丫环仆女几十人，雇工最多时达几百人，据说有能“烧死驴驹子”的灶台。同时，张大脚本人还为张家霸占了七千亩土地。

主持靳家家政的张大脚见我带着同学回来，开始很高兴。她早就希望我能够回家来继承她创置的家业。其实，她还做着一场黄粱美梦呢！哪里知道，我们就是来打碎她的美梦的。不过，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长大的青年学生，根本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群众，对如何开展农村工作几乎是毫无所知。想来想去，最后归结到我这个“家”上，准备通过靳家的佃户、雇工和其它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做些宣传发动工作，启发他们的觉悟，起来反对地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，抗日救国。为此，我们买了汽灯、黑板和其它文具，办起农民夜校。我的这种破坏张大脚统治的行为被她觉察了，她就极力地监视、限制、干涉我们。一连好几天的晚上，我们好容易邀来几位青年农民弟兄刚准备上课，她闯了进来，破口大骂，搅乱了课堂，对我她并不过多的责备，却仇视我的同学，骂他们不办好事，吃她的，喝她的，还带坏了靳家的后代（指我），要赶他们走。这时，我便站出来替他们辩护，向她讲抗日救国，讲点新思想。她根本不听，翻脸骂我是靳家的不肖子孙。

由于恶霸地主张大脚的破坏，那些农民弟兄谁还敢接近我们？在望云呆不下去了，我们便转移到邹县城里，住到了邹县地方实力派联庄会长、乡农学校校长刘兆汉处。因他早年曾随靳云鹗当过副官，是不会拒绝我们的，重要的是我们想通过他掌握些武装，

再就是开展学生运动。在县城，我和李立知两人负责做上层分子的统战工作，邝炳跃等三人负责动员群众，重点是向乡师学生和其它知识分子做宣传工作。在我们的影响下，乡师师生的抗日活动大为高涨，纷纷到街头张贴标语，开会讲演，讲日寇的侵略罪行。许多人听了痛哭流涕。我们还到邹东的田黄、张庄一带山区看地形，准备建立起游击队来的活动区域。这一时期，我们先后发展了十余名“民先”队员。但在学生运动中没能和统一战线很好地配合，在正需要利用刘兆汉的时候，有的同学过激，要发动群众“抬”他；再就是我们工作中没有注意适当的隐蔽，广为散发和出借进步书刊，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，常派特务跟踪盯梢我们，特别引起秦启荣的两个哥哥秦启棠(向南)、秦启梅的忌恨。加给我们的罪名是影响了他们的所谓“治安”和“国民秩序”，要赶我们走。刘兆汉也开始对几位搞学生运动的同志不满。形势一天天恶化，越来越不利于我们，后来竟准备抓我们。对我，他们一时还不敢轻易得罪，“军阀家庭”在这种环境下还是一把保护伞。他们是想抓我的同学，也达到了赶我离开邹县的目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只得决定让李焕、滕国定、邝炳跃三位同学赶快离开邹县，回“民先”省队部。不久，我和李立知又去泰安向省队部汇报工作。当时负责“民先”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指示我们：一、能够拉起队伍的话就迅速拉起来；二、拉不起队伍就先隐蔽下来，等省委派地下党的同志去后再图发展；三、隐蔽活动也有困难的话，就撤离邹县去延安。同时，省委给了两个联络点，一个是济宁的金明（外号金麻子）；另一个在滕县，只知道是个推小车的，具体是谁不大清楚，估计是李乐平同志的交通员。我们回到邹县后，又发生了意外：秦向南串通警察局查封了我们的“民先”办公室，收去了“民先”刊物和进步书籍，我从家带出的两支短枪也被拿走。刘兆汉躲了起

来不给见面，敌人还声言要抓李立知，事态发展十分危急。我当即决定离开邹县城，第一步先到望云。为了保护李立知，让他骑我的摩托车先走。我雇了两辆洋车拉着行李和书籍断后。形势恶化得非常快，在我出西门时，守门警察和一群士兵拦住去路，气势汹汹的非要搜查不可。这时，我就通名报姓，亮出靳家的“牌子”，对他们喝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敢拦我！”这一手倒真灵，马上出来一个警官赔礼道歉，乖乖地送我出城。

到望云后，我和李立知按照省委给的联络点，分别到济宁和滕县与地下党的同志联络，结果都没联络上。在望云有张大脚从中破坏，群众不敢接近我们，有枪没有人，也拉不起游击队来。到十二月底，还未等来接头的地下党的同志，日寇已进占兖州，在望云就可听到敌人的枪炮声。我们也无法再继续活动，便决定执行第三个方案——到延安去。

我要走，在望云的家里当然谁也不敢管，他们就派人星夜去郑庄报告了张大脚。她坐着辆四匹牲口拉着的大车，带着家丁飞快的追来，终于在石墙村南的大路上赶上了我们，非要把我拉回去不可，对李立知更是骂声连天。当时，我二弟是被我们动员出来的，也和我站在一起同张大脚进行说理斗争。她又是吵又是闹，说：“我千辛万苦置下这些田产，就是为着你们继承下去过好日子的，你们走了我怎么办？”我回答她：“你想给谁就给谁，我反正不当地主家的寄生虫，不当农民的吸血鬼。”我们果断地推起装着行李的自行车向着延安出发了。再回头看，张大脚立在大路边，无可奈何地哭了。

回顾在邹县的这段斗争活动是有教训的：我们偏重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活动，没有做到和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，应该说，革命的主力是工农民众；再就是我们离开济南时，手抄了一份《苏联红军游击战争条例》，准备照着这个《条例》去拉游击，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不是笑话！后来知道，就在我离开望云的第二天，省委派回邹县的地下党员冯起同志（刚出狱）就找到了我家，但已经晚了。他们拉游击队苦的是没枪，而我是有枪没人扛，如果结合起来，队伍不就很快拉起了吗。结果只差了一天的时间，便造成我们终生的遗憾。

（三）

一九三八年元旦，我与李立知同志到达徐州，又经郑州、洛阳到达西安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叫我们先去安吴堡青训班。当时冯文彬、胡乔木等同志在安吴堡主办青训班。在青训班，我们遇到了许多北平、天津来的进步同学，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，训练班内有党的半公开活动。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我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也可以说，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。

一个月的学习结业后，我被分配到西安办事处，在林伯渠同志身边工作，负责编报纸摘要。在同林老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触中，我体察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与旧政府和国民党的官僚有着天渊之别。他们和蔼可亲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谦虚谨慎，忘我工作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公仆，使我深为敬服。林老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，又姓靳，一天他问我："山东有个靳云鹗，是军阀，你知道吗？""那是我父亲。"我回答。林老听后以奇异的目光久久地望着我，似乎在说，军阀的儿子参加了革命？我把自己的身世，冲出家庭的前后经过向林老讲了一遍。林老以赞许的语言，给我亲切的抚慰，他勉励我在革命队伍里扎根、开花。那时，我中心思想是不到延安不死心，再就是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总觉得自己能够当一名共产党员才是最光荣的。我连续向林老提了几次入党的要求后，林老便推心置腹地说："不要心急嘛，要安心好好工作，只要表现好，组织上会找你的。"

虽然林老如此解释，可我还是安不下心来，一心想上革命圣地延安。出于青年人的执拗，就象小孩撒娇似的多次向林老要求。最后那次，我几乎快要掉下泪珠来，他才答应了我。

大约在三月底，我和王雨田等同志一块动身去延安，正好和白求恩大夫坐一辆卡车。他坐在驾驶室里，我们趴在车上的大米包上（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这幅照片）。当时，我只知道他是个外国人，不知道他的姓名和到中国干什么来了。到延安之后，对白求恩大夫才有了些了解。知道他是加拿大医生，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，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。当时，我想：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，离别了自己的国土和家园，仅这一点就十分可敬，况且他在工作中满腔热忱，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！我们作为中国人，为了解放自己的民族更是责无旁贷。从那以后，白求恩大夫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眼前，他的可贵精神成了促使自己思想进步的动力之一。

在延安，我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二大队一队，罗华生同志任我们队的队长。在抗大，我们这一期大部分是平津流亡学生和全国各地的学生。一队队的学生就象股股涌出石缝的山泉小溪，七折八弯，终于汇流在革命的洪流里。我们一块学习，一块劳动，一块操练，心情十分愉快。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，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——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要求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，在那之后的连续几天里，心情都平静不下来，我感谢党，就象感谢不嫌弃儿女丑陋的母亲一样。尽管儿女丑陋、不懂事、顽皮，可是，母亲总是亲切而温存地抚慰他，哺育他。从此，我立下了为共产主义、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身的誓愿。

同年七月，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去延安要干部，中央遂选

派一百六十多名干部（多是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生，其中有红军老干部二十人）去山东。出发时，这一百六十多名干部分为一个司令部和一个干部队。司令员张经武，政委黎玉，政治部主任江华，参谋长吴克华；干部队长胡奇才，指导员徐斌州。我在干部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。队伍于八月十日由延安出发，经过近四个月的步行，长途跋涉四千多里，于十二月初抵达中共山东分局的驻地沂水县岸堤村。分局以我们来的这批干部为主，正式宣布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。组织上分配我到十二支队任团政委。那时，我才二十岁，要挑起这副重担确实有困难。但是，党相信我，我决心沿着党所指引的革命之路走下去。

（四）

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年代里，我主要活动在鲁南地区，先后在十二支队、中共鲁南特委、第三地委、鲁南区党委、鲁南一军分区、一一五师、铁路工委等处工作。

初到鲁南时，那个“家”对我依然不死心，庶母和张大脚几次派人看望我，给我送些东西，“感化”我，以图最终把我拉回去，为靳家继承家业，支撑门户——想得多美哟！我是背叛了剥削阶级的共产党人，是革命军人，和他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，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对立阶级的关系。不过，他们既然派人来，也好，部队很困难，把带来的东西留下，大家一块改善生活。一九三九年冬，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地区，由于敌人的封锁，部队的药品非常困难。师政委罗荣桓同志找三地委书记宋子成同志想办法搞些药，子成同志想起可以利用我那个“家”。于是，我就给天津的“家”写了信，让他们帮个忙。他们对我背叛家庭虽然很愤恨，但我总还姓靳，他们还是帮忙的。不久，价值四千多元的药品就送到了——

五师卫生部长谷广善同志处。

我最后一次“回家”是一九四四年夏天。我和熊天仁等同志带领部队去开辟邹西，在歼灭了反共顽军马光汉匪众后，部队就开进了郑庄我的老“家”。张大脚虽然持敌视态度，但我们有枪杆子，带着部队，她毫无办法。队伍得到了几天休整，并吸收了我家的一些青年雇工参加部队。从那以后，就与我故乡这个“家”断绝一切关系。

回顾在鲁南打游击的岁月，生活的确是很艰苦的，半年糠菜半年粮，分文无有，在由陕北到山东的长途行军中，几次轻装，把衣服、被子都丢光了。到鲁南时，我的一条棉被是“家”里来人看我时留下的，身上穿一件空心棉袄。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我去山东纵队指挥部汇报工作时，因我患有哮喘病，领导上照顾发了一件大衣。这样我就比其它同志好多了。生活尽管艰苦，但心情却是很愉快的，原因是有苦同当，有饭大家一块吃，深深体会到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，是非常必要的。

说到物质生活，自我离家之后，当然是一落千丈。在平津期间，全家人都是披绸裹缎，食腥餐膻。我读中学时，家中每月就给我四十元的零花钱，交学费和买衣服可以另拿。所以，那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挨饿，什么叫受冻。参加革命之后，生活是大变了。但不再吃剥削来的饭了，我心里却非常高兴。我从来认为，一个人单纯追求物质生活享受是没出息、没出路的。艰苦的生活正好可以磨炼一个人的革命意志。再说，革命部队和战争时期的广大群众生活都是艰苦的，人家能受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受？！不择手段的贪图舒适，庸庸碌碌了却一生是最卑鄙的。

可是，在我家里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兄弟，几乎没有不迷恋家庭的那种优越生活的。就说比我小一岁的二弟，当年作为平津流亡学生在我们决定离开邹县时，总算把他说通了，愿意和我们一起

去延安干革命，在和张大脚斗争时，他也和我站在一起，到了郑州，他便和他一个同学去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。后来知道，他吃不了苦，没几个月就开了小差，绕道重庆，经香港回到天津，过起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生活，后来成了吸毒犯，被判刑死在劳改农场。比我小三岁的三弟也舍不得养尊处优的贵公子生活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，竟跑到土改后的老家去倒租，也被判了刑。正是由于那个罪恶社会，罪恶家庭的影响，使他们走上了反动的道路，被人民被历史所唾弃。如果我不是走上革命的路，也没有我的今天。济南解放之后，在房地产登记时，对大观园的财产我拒绝登记，由政府作为无主产业处理了。为此，靳家的人骂我是“傻瓜”、“不懂事”。其实，不懂事的是他们，大观园原本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，难道不应归还给人民？

我之所以走上革命之路，是由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，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推动下，经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受到了革命教育，对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有了一定认识。党所实行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，团结各种各样不愿当亡国奴的人，其中包括我这样坏的家庭出身的人。而我自己则仅仅是个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，不甘堕落，不愿当阔少爷，更不甘做亡国奴，愿为挽救民族危亡出把力，所以，就毅然离开家庭，抛却了所谓荣华富贵，叛离了封建正统思想和传统，跟共产党走，到革命队伍中去。直到现在，我常常给我的孩子们和青年人讲，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经济利益，那样会成为近视眼的。要多为国家、为民族想想，多出点力，只有整个国家富强了，才有全民族美满幸福的生活。

我很欣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那本书中的保尔·柯察金的一段话，他说：“人最宝贵的东西——生命。这生命，人只能得到一次。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：当回忆往事的时候，他不至

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，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；在临死的时候，他能够说：‘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，都已经献给世界之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。’”回首我的前半生，还总算没有辜负人民对我的养育，为党为人民做了点工作，这也是我聊以自慰的。但是，还很不够，我决心将有生之年，微薄之力，全部贡献给祖国伟大的现代化建设事业。

按：靳怀刚同志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一位老同志，现为上海市人大常委。他以亲身的经历，记述了他叛离家庭走向革命和在邹县的革命活动概况。这份回忆录对于了解我市党的历史、进行传统教育很有帮助，是一份珍贵的革命史料。此稿系根据录音整理，已经本人初步审定，基本无误。

曹志尚同志传略

孙智先　朱锡禄

曹志尚同志原名曹凌云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济宁市嘉祥县老僧堂乡大曹庄人。一九〇三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，自幼上学，在校学习期间，品学兼优，主持正义。十八岁那年，从汶上放学回家，途经老僧堂集会，看到一个警备队士兵无故痛打老百姓。他挺身而出，为受害者打抱不平。由于寡不敌众，被警备队绑架走了。经过他父亲求亲告友花了好多银钱才保了出来。从此，他对旧官府人员仗势欺人、横行霸道极为愤恨。那时就有将来要治理好国家的雄心和抱负。

他高小毕业以后，与同学们一齐考入了东北军学兵队。北伐胜利后，在汶上县国民党党部任职。因他不肯与腐败官僚同流合污，受到排挤和打击而弃职回乡。

一九三〇年鲁西南黄水泛滥，灾情严重，民不聊生。但旧政府照样收纳苛捐杂税，逼得百姓携儿带女离乡背井，逃荒要饭。这时，志尚同志就联合黄北乡、杜垓乡、曹庄乡等五个乡的代表到汶上县政府要求减免粮税。可是，国民党的官吏哪能听进民众的呼声，随之将请愿书驳了回来。但他们并没有灰心，五乡代表共同商议：县政府不答应，就写呈子递交省政府。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很快传到伪县长耳朵里，便对志尚下毒手。伪县长诬志尚同志以聚众闹事，虚报灾情，抗缴国粮为名下了通缉令。这样一来，激起了五乡民众们的强烈反抗。志尚等人亲自到了济南山东省政府上告。经过多半年的斗争，终将伪县长告倒了。可是，县

政府的鹰犬爪牙仍在那里作威作福。为了防止他们的暗害，不得不逃离他乡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，曹志尚同志正在本县杨庄教小学。芦沟桥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。这时，他在校内外极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每逢集会便登台演讲，率领学生进行街头宣传，大唱《流亡三部曲》、《大刀歌》等抗日歌曲。

鬼子进关了。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。曹志尚同志在杨庄小学也维持不下去了，便决计到汶上城里去找老同事老同学共议抗日救国大计。最初他和陈伯衡等同志成立了文化书社，秘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。不久，中共山东省委派来地下党员刘星同志为特派员，曹志尚同志经刘星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随后，为了开展抗日救国工作，便回到了家乡梁宝寺建立了文化分社，作为秘密联络处所。

日寇深入，山东沦陷。曹志尚同志首先和十几个亲友在本县方官屯建立了抗日自卫队。动员乡亲们有人出人，有钱出钱，有枪出枪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。根据党组织的指示，还要发展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为骨干力量，所以队伍很快就发展到近百人。他每天亲自讲课、领导操练，情绪十分高涨。

一九三八年一月份，陈伯衡、曹志尚和刘星等同志联合了一切抗日力量，在永安寺发动了武装起义。这时，队伍也扩大到五百多人。从此，这支队伍便命名为“鲁西南抗日自卫队”。经民主推选，陈伯衡同志为抗日自卫大队的大队长，曹志尚同志为副大队长，刘星同志为政委，并庄严宣布：严格执行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，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。

起义之后，队伍便开到汶上县杨集进行整训。在整训期间，忽然接到情报员的报告：兖州的日本鬼子和伪军有二百多人出发到汶上。曹志尚同志接到情报后，便与刘星、陈伯衡同志商议决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